

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

严善平

摘要 依据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对90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②在迁移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迁移人口的迁出地结构和流向都在发生变化;③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④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作者 严善平,男,1963年生,199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获农学博士学位(农业经济学)。现任日本桃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一、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致使就业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据统计,第一产业的就业者比率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1995年的52.9%,17年中降低了17.6个百分点,大大超过1952年至1978年26年中下降的13个百分点。^[1]在80年代,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离土不离乡,而进入90年代以后,由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的地区间劳动力转移也加快了速度。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不仅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对推进城市传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社会结构、提高内地农民收入和缩小地区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中列入了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调查项目,各级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以及学者也对人口、劳动力的地区间转移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方式、迁移主体的个人属性和地域属性等等有了深入的理解。^[3]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90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定量描述,并对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主要依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必要时也利用以前的各种人口调查资料或其他经济统计资料。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首先对几次人

口调查中迁移人口的定义进行检讨,在此基础上,分析过去十几年中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人口转移与经济的关系、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分布状况;第二,建立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计量分析,以揭示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内在机制。

二、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

1. 人口调查中的迁移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曾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而把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状况纳入调查表始于1990年的第四次普查。但是,因为在1987年和1995年进行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加进了人口迁移的有关项目,并且调查的对象从调查时点倒推5年,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获得1982年至1995年间有关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数据。

但要注意的是,由于每次调查赋予迁移人口的概念都有些微妙的差别,所以,在对迁移人口的规模进行纵向比较时,有必要消除概念不同所带来的不可比成分。我们对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A调查)、1990年人口普查(B调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C调查)中的有关项目进行整理发现(参照表1):①三次人口迁移调查在时间上并不衔接,1990年7月至9月没有作为对象;②迁移人口的移动空间不一致,A调查和C调查定义为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而B调查为离开户口所在县市1年以上;③B调查以5岁以上人口为对象,而A调查和C调查对此没有限制;④在A调查和C调查中要求迁移者填写迁入现住地的具体时间,而B调查却没有这个项目;⑤A调查和B调查中有迁移原因的调查,而C调查却没有;⑥在迁移范围方面,从A调查和C调查中可以知道县内乡外、省内县外和省际间三个层次的情况,而B调查却没有县内乡外的部分。

表1 人口调查中迁移人口的定义

	1987年1%抽样调查	1990年人口普查	1995年1%抽样调查
调查期间	1982.7.1~1987.6.30	1985.7.1~1990.6.30	1990.10.1~1995.9.30
迁移者定义	·离开户口登记地(乡镇、街道)6个月以上 ·户籍发生迁移者	·离开户口所在县市1年以上 ·同左	·离开户口登记地(乡镇、街道)6个月以上 同左
对象者年龄	全迁移者	5岁以上	全迁移者
迁入现住地时间	需要填写	无需填写	需要填写
迁移原因	有调查项目	有调查项目	没有调查项目
迁移范围	县内乡外、省内县外和省际迁移	省内县外和省际迁移	县内乡外、省内县外和省际迁移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3年;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1991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编,199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1997年整理。

(注)省是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略,县为县及县级市的省略。

2. 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向的变化

(1) 地区间迁移人口的规模变化

众所周知,在中国由于户口制度的影响,迁移人口通常指伴随户口在不同地区间进行迁移的那部分人口,户口登记地不发生变化而实际上在地区间迁移了的人口通常被称为流动人口。^[4]迁移人口通过户口登记制度在数量上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把握,而流动人口因没有常

规统计,直到80年代初都是个未知数。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首次对户口不发生迁移而实际上迁移了的人口也作了调查,从而可以推算1982年7月以来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全部迁移人口的规模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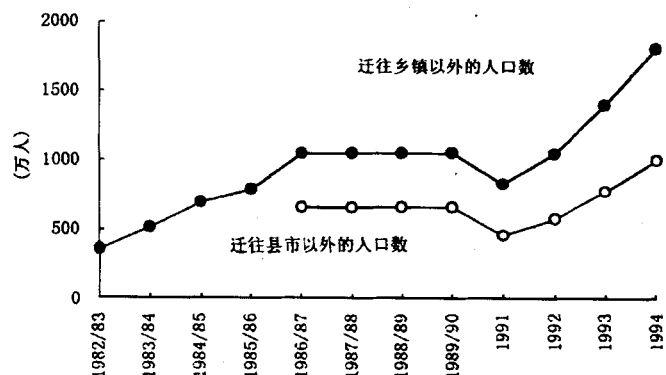


图1 地区间迁移人口的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杨云彦.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1992(5);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图1反映了1982年7月至1994年底乡外迁移人口和县外迁移人口(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或户口发生迁移的人口)的规模变化情况,其中1982年至1990年的数字为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的迁移人口,1991年至1994年的数字为1月至12月的迁移人口。为了确保各年度间数字的可比性,我们对A调查、B调查和C调查中迁移时间不足一年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即排除了A调查中1986年7月~1987年6月、C调查中1990年10~12月和1995年1~9月的数字。还需要说明的是:①1986/1987年~1989/1990年的推算数中包含了0~4岁的人口,而其他的将之排除在外;②1986/1987年~1989/1990年的乡外迁移人口根据A调查中乡外县内迁移人口的比率推算而得,^[5]但考虑此间人口迁移的范围不断扩大,该推算值可能偏大;③1991年以后县外迁移人口为实数,乡外移动人口根据C调查的有关数据推算而得。综上所述,图1所表示的迁移人口的规模只能反映一个大致倾向,各年度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同时,离开户口登记地不足一年的、或在调查期间曾发生过迁移而在调查时点已返乡的、或迁移经过5年以上的都没有被列为调查对象,故此,图1所反映的并非所有迁移人口,它只能表示每年新发生的迁移数,而不代表迁移人口的存量。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80年代初以来人口迁移的基本情况作以下描述:中国的地区间人口迁移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扩大,乡外迁移人口的规模从1982/1983年的363万人迅速扩大到1985/1986年的790万人。1986/1987年~1989/1990年的数值可能偏大,但可以估计此间乡外迁移人口每年至少达800万人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人口的流动化明显增强,乡外迁移人口从1991年的828万猛增到1994年的1800万,其中县外迁移者也从458万人激增到995万人,扩大了1.2倍。总而言之,近十几年来,地区间的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向县外的范围迁移也在同步增加。

(2)地区间人口迁移的方向变化

我们从迁移人口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构成变化来考察一下迁移方向的变化。表2根据A调查、B调查和C调查的有关数据整理而成。因为表2中的迁移人口依据表1所示的概念,所以表中的迁移人口数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这不影响我们所要分析的迁移方向。

从同表可以看出,在1990年10月至1995年9月的5年中,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或户口发生迁移半年以上的县外迁移人口共达3323万人,其中来自乡村的1986万人占59.8%,来自

表2 地区间迁移人口的迁出地和迁入地构成变化

		合计	乡村	镇	城市
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82~1987年)	迁移者总数·万人	3044	2070	428	547
	迁出地构成·%	100.0	68.0	14.1	18.0
	城市	36.6	33.2	23.6	59.8
	镇	39.8	41.3	49.8	26.1
	乡村	23.6	25.6	26.6	14.0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1985~1990年)	迁移者总数·万人	3384	2118	637	629
	迁出地构成·%	100.0	62.6	18.8	18.6
	城市	61.7	58.8	65.3	67.8
	镇	20.1	18.7	24.9	19.8
	乡村	18.2	22.5	9.7	12.5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1995年)	迁移者总数·万人	3323	1986	311	1027
	迁出地构成·%	100.0	59.8	9.3	30.9
	城市	61.4	50.8	65.6	80.6
	镇	10.0	9.3	18.8	8.7
	乡村	28.6	39.8	15.6	10.7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①此表中的地区间迁移人口包括县市以外的户口迁移者和户籍不发生变化但实际上迁移了的人口;②1990年调查的迁移人口为离开户口所在地1年以上、5岁以上人口,而1987年和1995年调查指离开户口登记地(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全部人口。

集镇的311万人占9.3%,来自城市的1027万人占30.9%;这些迁移人口有61.4%迁入城市,10.0%迁入集镇,28.6%迁入乡村。就总体而言,迁移人口大多数来自乡村,但他们的迁入地却大都是城镇;但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关系来看,乡村来的迁往乡村,城市来的迁往城市所占比率相对较高,但城镇来的也有相当一部分迁往乡村。

将C调查与A调查、B调查的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①在迁移人口中,来自城市的比率大大提高,从A调查的18.0%增加到C调查的30.9%。这表明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市人口的流动;②从迁移人口的迁入地构成来看,迁往农村的比率明显提高,从B调查的18.2%增至C调查的28.6%。这主要源于乡村间同层次的人口流动加快。因为乡村来的迁移者再迁入乡村比率从B调查的22.5%上升到C调查的39.8%。但尽管如此,农村是迁移人口的主要源泉,城镇是他们的主要落脚地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另外还要指出,县外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外的比重在B调查和C调查中分别达到32.0%、32.2%,与A调查的21.6%相比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可以说,市场化改革带动了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和组合。

3.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

(1) 暂住人口比率

上述三次人口调查都对离开户口登记地(乡镇、街道)或户口所在县市一定期间(一年或半年)以上的人口作了调查,并定义其为暂住人口。这个数字显然比《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的在非户口登记地滞留3天以上必须作暂住登记的暂住人口数要少得多,但对把握人口流动化的状况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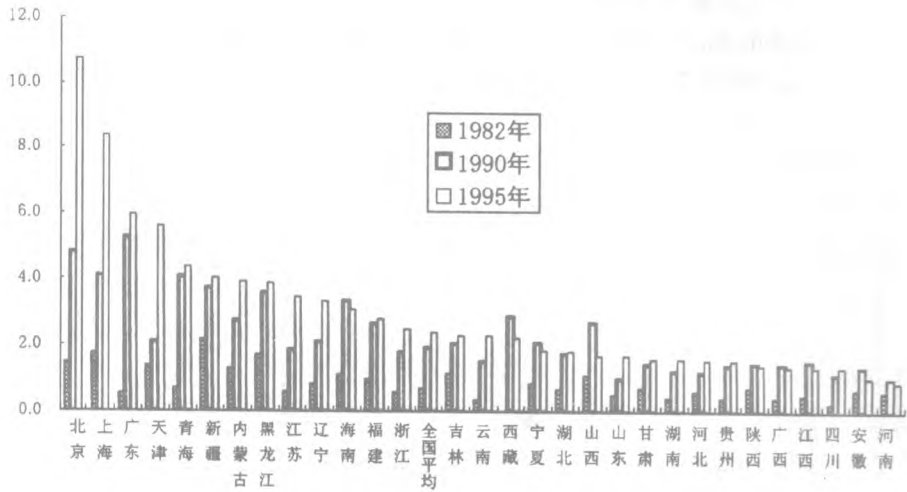


图2 暂住人口比率的推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人口统计年鉴1991年、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注:①1995年为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迁移人口,其他为1年以上;②暂住人口比率=迁往县市以外人口/总人口。

图2表示1982年、1990年的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各省(市区)暂住人口的比率(从外县市迁入的暂住人口占本地总人口的比率。其中1995年数字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其他为一年以上)。从全国平均来看,暂住人口的比率1982年为0.7%,1990年为1.9%,1995年也不过2.4%,可谓非常之低。但从不同地区来看,1995年高于全国平均的有13个省(市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和天津的比率特别显目,分别达10.7%、8.4%、5.9%和5.6%,比1982年的1.5%、1.7%、0.5%和1.4%高出4~12倍。如果以离开户口登记地的乡镇、街道为标准来计算暂住人口比率,则1995年的全国平均为4.5%,北京、上海、广东和天津分别上升到14.8%、11.9%、10.0%、10.7%。

下面分析暂住人口比率与经济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这里,我们以1995年各省(市区)人均国民总产值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以1991年~1995年各地国民总产值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代表经济发展速度,并将其与暂住人口比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暂住人口比率之间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8。经济水平越高,外来人口的比率也越高。这意味着,“人往高处走”这一常识,或者说人们的合理经济行为在市场化改革中逐步得到体现,而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计划经济时代却是得不到许可的。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与暂住人口比率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这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人口的迁移方向主要不取决于经济的活力或相对的速度,而在于已达到的经济水平。

(2) 迁移人口比率

下面,从人口迁出地角度进一步考察迁移人口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图3分别表示1995年各地乡外迁移人口和县外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省际间迁移人口占县外迁移人口比率与1995年人均国民总产值的相关关系。从图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迁移人口的比率也呈增大趋势,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以上。同时,迁移人口比率的变化对人均总产值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人均总产值每增加1%,乡外迁移人口比率增加1.071%,县外迁移人口比率增加0.988%。但是,在县外迁移人口之中,省际间迁移人口的

比率却随着人均总产值的提高而降低,并且在人均总产值相对较低的阶段,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1995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省际间迁移人口比率对人均总产值的弹性值为-0.887。即人均总产值每增加1%,县外迁移人口中出省(市区)的比率下降0.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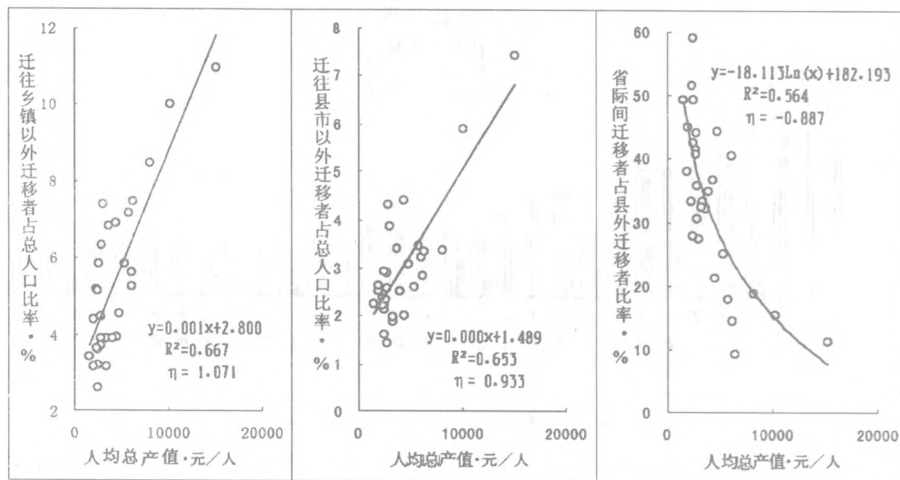


图3 迁移人口比率与人均总产值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注:η表示人均总产值的变化对迁移人口比率变化的弹性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90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特征作以下结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活泼,但这种迁移相对集中于省(市区)之内;而在经济不甚发达地区,迁移人口的比率本身较低,其中迁往外省的比率也相对较高。

4. 省际间人口迁移的状况

(1) 人口的迁出地与迁入地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内地省区与沿海一带在经济水平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导致了人口流向由西朝东的基本格局。下面通过1990年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说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分布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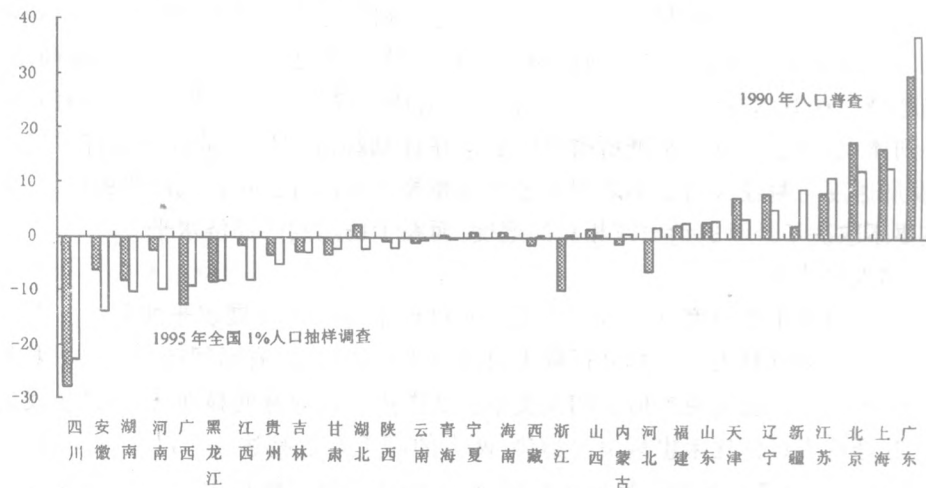


图4 各省(市区)纯迁出·迁入人口的构成比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2。

图 4 表示了省际纯迁移人口的构成及其变化情况。根据此图可以指出：①除湖北、浙江和河北以外，纯迁出地和纯迁入地在空间分布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②据 1995 年全国 1% 人口调查，四川、安徽、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和贵州依次为纯迁出人口最多的前 7 个省（区），合计比率达 83.2%，而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新疆和辽宁依次为纯迁入人口最多的 6 个省（市区），合计比率达 87.4%。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迁移在空间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倾斜；③在 1990 年至 1995 年的 5 年中，安徽、河南和江西提高了作为纯迁出地的地位，新疆、江苏和广东提高了作为纯迁入地的地位，而四川、天津、辽宁、北京和上海却降低了作为纯迁出地或纯迁入地的地位。

(2) 省际间人口迁移与双向移动的程度

如上所述，中国地区间人口迁移的总体流向由西向东，但这并不否认在省（市区）际之间存在双向移动。为了考察这种双向移动的程度，我们在这里导入“双向流动系数”，其定义为：从 A 地的迁出人口 - 迁入 A 地的人口 / 从 A 地的迁出人口 + 迁入 A 地的人口，该系数的数值在 -1~1 之间。双向流动系数越接近 0，则表示双向的迁移人口相对较多；而接近 1 或 -1，则表示单向的人口迁移较多。

依据以上定义，并利用 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资料即可得到图 5，横轴为人口的纯迁移数，纵轴表示双向流动系数。显而易见，在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存在着三个状况明显的地区群；偏右上方的为人口纯迁入地区，并且主要呈单向迁入；偏左下方的为纯人口迁出地区，并且主要呈单向迁出；靠近原点的地区群属于双向迁移较多的地区，但纯迁移量却很少。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在现阶段，中国的地区间人口迁移主要是单向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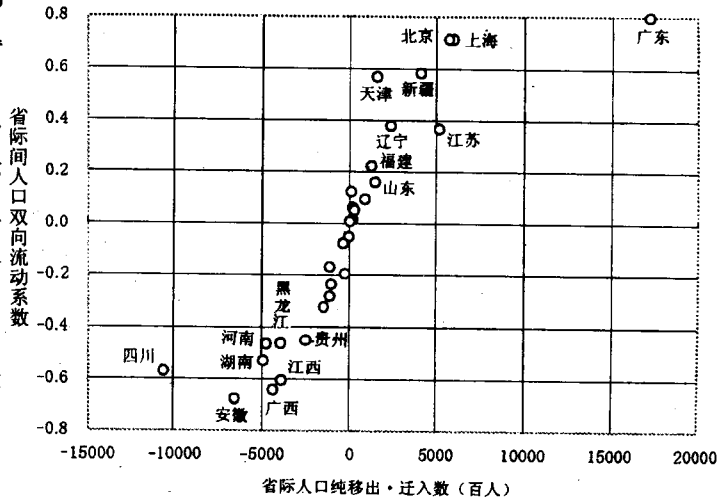


图 5 省际间人口的双向迁移程度与纯移出·迁入人数

资料来源：同图 2。

三、省际间人口迁移的要因分析

1. 先行研究的检讨

有关人口、劳动力在地区间迁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西方学界积累了大量的成果，^[6]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迁移的统计资料不断丰富，不少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对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发生迁移的原因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分析。例如，李树茁利用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对 80 年代地区间人口移动的原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7]指出了不同地区经济水平（人均总产值）和经济结构（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率）上的差异，以及迁移距离（指省[市区]政府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与纯迁移率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差越大，纯迁移率也变大，而移动距离对纯迁移率有较强的负面影响。王桂新利用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8]也指出了省际人口迁移量与距离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关

系。

通过家计调查,获取地区间迁移人口的有关微观数据,如迁移主体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所属家庭和居住地的有关经济情况,并使用多变量解析法(重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来说明迁移及影响迁移的要因。^[9,10,11]

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下面对李、王的分析方法和结论进行若干评论。第一是如何看待距离效果的问题。众所周知,进入90年代以来,外出打工以获取更高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农村劳动力是地区间迁移人口的主体成分。但这并不是说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都能流向高收入地区,实际上是否发生迁移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地区收入差的大小,个人属性和地区属性,有关迁移信息的有无也十分重要。因为,在地区间迁移了的劳动力人口中,有绝大多数是通过家里人、亲戚朋友、同村人的介绍,或从他们那里获取有关信息才得以迁移的。^[12]迁往较近的高收入地区,不仅可以节省伴随迁移发生的物质费用,同时还可以减少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费用,但是,如果能提供信息的人远在他地,一般地也只能迁往那里。由此可见,在考察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要因时,有必要考虑地缘和血缘在其中的作用。第二是迁移距离的测定方法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都以省(市区)政府所在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为迁移距离。^[13,14]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因为无论是铁道还是公路都不是直线的。第三个问题是把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放入同一个计量模式可能产生的重相关问题。因为根据 petty-clark 法则,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15]

2. 理论假设、数据和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定量分析的结果和已有的研究积累,本文对90年代中国地区间人口迁移提出以下理论假设:第一,地区之间人口的迁移量主要取决于两地间的收入水平差或工资水平差。通常,两地的收入差越大,人口迁移的规模也相对增大,即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我们把收入差对迁移量的影响称为“收入效果”。第二,两地间的人口迁移量与经济成长率的差呈正相关关系。经济成长速度越快,意味着经济的活性化程度提高,新的工作机会也相应增加较快,这会带来人口迁移速度的加快。我们把这种效果称为“活性化效果”。第三,从A地迁往B地的人口流量取决于已经迁入B地的A地出身者的相对规模。换言之,A地的迁出人口往往较为集中地流向A地出身者较多的其他地区。我们把这种效果称为“迁移人口的存量效果”。第四,地区间的人口迁移量与迁移距离有负相关关系。^[16]因为人们离开生活习惯了故乡越远,不仅交通费等直接成本上升,心理方面的负担也相应增大。我们称之为“距离效果”。

为了检验以上的理论假设,我们给出以下地区间人口迁移模型:

$$M_{ij} = a(GDPP_j/GDPP_i)^{a1i}(RD_{ij})^{a2i}(M_{ij}/\Sigma M_{ij})^{a3i}(RGDP_j/RGDP_i)^{a4i} \quad (1)$$

这里, M_{ij} 表示从*i*地迁往*j*地的人口数。①GDPP表示人均总产值,以迁入地对迁出地的指数来表示地区间经济水平和人均收入差,并分析其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没有采用工资指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各省(市区)的平均工资统计只反映城市的情况,而不包括农村地区。但是,因为人均总产值是反映经济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利用该指标来分析地区间收入差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有一定的合理性。② RD_{ij} 表示从*i*省(市区)政府所在地到*j*省(市区)政府所在地的最短铁道距离。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迁移人口都利用了铁道,而只想以此代替伴随迁移所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费用。③ $M_{ij}/\Sigma M_{ij}$ 为1990年人口普查中*i*省(市区)迁出人口在各迁入地的构成比。我们把它作为迁移人口存量的代理变量。^[17]就是说,在1985年7月~1990年6月的5年中,从A地迁入B地的人口占此间A地总迁出人口的比率作为1990年10月~

1995年9月间同方向人口迁移的存量指标。④RGDP为1991年~1995年间各省(市区)国民总产值的年均实际成长率,以迁入地成长率对迁出地成长率的指数,来分析各省(市区)经济活性化程度的差对人口迁移量的影响。⑤ i, j 表示全国各省(市区),但在具体的计量分析时, i 被限定在8个最大的人口迁出地,即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广西、黑龙江、江西和贵州。⑥ a_1, a_2, a_3, a_4 分别表示收入水平差、移动距离、迁移人口存量和成长率差对迁移量的弹性系数。

在推测人口迁移模型时,我们采用了以下的对数回归方程式:

$$\text{LOG}(M_{ij}) = a_{0i} + a_{1i}\text{LOG}(\text{GDPP}_j/\text{GDPP}_i) + a_{2i}\text{LOG}(\text{RD}_{ij}) + a_{3i}\text{LOG}(M_{ij}/\Sigma M_{ij}) + a_{4i}\text{LOG}(\text{RGDP}_j/\text{RGDP}_i) \quad (2)$$

3. 计量分析结果的解释

基于(2)式的人口迁移模型,我们对1990年至1995年间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在推测主要人口迁出地的迁移模型时,首先将4个变量全都代入(2)式进行重回归计算,检查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如果 a_1, a_3 和 a_4 的符号为正, a_2 的符号为负,则认为该模型可以通过;如果回归系数的符号与上述不同,则将其从方程式去除,再重新测算,直到所有的回归系数符号有意义。

表3 主要地域的省际人口移动的要因分析(1990年10月~1995年9月)

	a_0	a_1	a_2	a_3	a_4	R_2	自由度
四川	2.773	0.451	-0.277	1.103	0.759	0.855	22
t值	12.308*	1.809***	-0.720	9.1778*	1.8178***		
安徽	1.780	0.659		0.835	0.621	0.832	23
t值	6.38*	2.173**		2.995*	1.163		
河南	1.575	0.657		1.126	0.428	0.890	23
t值	8.114*	3.594*		11.769*	1.260		
湖南	3.547	0.288	-0.618	0.760	0.657	0.862	22
t值	12.991*	1.114	-2.001	5.931*	0.166		
广西	3.426	0.564	-0.623	0.980		0.851	18
t值	11.691*	1.809***	-1.207	6.400*			
黑龙江	1.679	0.239		1.073		0.931	24
t值	7.728*	1.187		15.772			
江西	1.567	0.303	-0.082	1.131	0.051	0.890	20
t值	5.719*	0.977	-0.205	4.517	0.067		
贵州	3.197	0.251	-0.583	0.719	0.986	0.795	18
t值	8.930*	0.640	-1.027	3.811*	0.93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铁道部编.全国铁道旅客时刻表 1997~1998年.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

注: *:0.01、** :0.05、*** 0.1有意义。

从表3的计算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各主要人口迁出地的迁移模型的决定系数值大多达0.8以上,证明同表的推测结果有较高的置信水平;②在各省区的模型中,经济水平或曰收入水平的差异对地区间的人口迁移量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四川、安徽、河南和广西,其影响的程度尤为明显;③迁移人口的存量因素对地区间人口的迁移量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迁移存量对迁移人口的弹性系数大,且有意水平很高(t检定结果,均在1%水平有意义);④距离效果在安徽、河南和黑龙江的省际间人口迁移中几乎不发生作用,在其他地区,距离虽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因为t值水平较低,难以断言距离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量的绝对影响。这一点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18,19]⑤不同地区经济成长率,或曰经济活性化程度的差异对人口

迁移量有正面的推进作用,但因回归系数的 t 值普遍较小,所以难以断定该因素的绝对影响程度。

如果上述解释成立,我们则可以进一步导出以下结论。即中国进入 90 年代以来,省际间迁移的人口数量主要取决于业已形成的迁移存量,间接表示地区间收入差的人均总产值的相对水平对人口的迁移有正面的促进效果,但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距离和经济活性化状况在省际人口迁移中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除了个人和地区属性以外,一个人是否在地区间发生迁移,当然要考虑到地区间经济收入或期待收入的高低,但这只是迁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最终影响迁移的是有没有能提供工作机会,或有关信息的渠道。考虑到目前人口在地区间迁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都依赖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这一事实,我们认为以上的推测结果和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由此可见,在前面提出的 4 个有关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理论假设中,第 3 假设(存量效果)得到了实证分析结果的最有力支持;第 1 假设(收入效果)基本上也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但这个假设并不适应所有地区;第 2 假设(距离效果)和第 4 假设(活性化效果)虽然不能完全否定,但在 90 年代以来的地区间人口迁移中,两者似乎不具有十分强的说服力。

四、结论

本文主要依据 199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 90 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其中主要结论如下:

①对过去几次人口调查的有关项目进行调整分析发现,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这一倾向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明显加速。

②县外迁移人口的半数以上来自乡村,但近年来,其比率有所下降,与之相对应的是,来自城镇的迁移人口比率大幅度上升;迁移人口主要迁往城市,但近年来,迁往乡村的比率上升较快;另外,在迁到县外的人口中,出省(市区)的比率有所上升。

③暂住人口比率在几次人口调查中明显上升,特别在发达地区,同比率上升更快。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加速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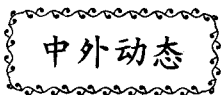
④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⑤影响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因素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但在以下 4 个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即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 2 陈俊生.要把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工作引向深入.中国劳动科学,1997(1)
- 3 严善平.中国における地域間労働移動.アジア経済 1997,38(2)
- 4 马侠编.中国城镇人口迁移.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 5 杨云彦.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人口与经济,1992(5)
- 6 石田英夫等.労働移動の研究.総合労働研究所,1978
- 7 李树苗.中国 80 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转移研究.人口与经济,1994(3)

- 8 王桂新.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人口与经济, 1993(2)
- 9 郭建军等.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多因素分析模型. 社会学研究, 1997(1)
- 10 赵跃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研究, 1997(2)
- 11 Qian, W.B.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thenaeum Press, 1996
- 12 赵树凯等.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 社会学研究, 1997(1)
- 13 王桂新.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人口与经济, 1993(2)
- 14 李树苗. 中国 80 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转移研究. 人口与经济, 1994(3)
- 15 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1951
- 16 Sjaastad, L. A. The cost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0, 1996
- 17 Greenwood, M. J.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Geographic Labor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1, 1969
- 18 李树苗. 中国 80 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转移研究. 人口与经济, 1994(3)
- 19 王桂新.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与距离关系之探讨. 人口与经济, 1993(2)



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鉴定会于 3 月召开

1997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从准备到登记、录入结束, 仅用了短短 6 个月时间, 普查方案是否科学可行? 普查质量究竟如何? 这是各方面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于 1998 年 3 月 5 日在北京市统计局召开专家鉴定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张为民、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邹兰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郭志刚、郝虹生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王树新等专家教授。

会上, 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果丽珠首先介绍了外来人口普查前段工作的主要情况, 张铁军同志演示了外来人口普查地理信息系统。

各位专家随后对这次普查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在发言中他们一致认为, 对于外来人口进行普查难度相当大, 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都无人搞过, 这项工作不一定是想做, 而是限于种种原因, 做起来很难。这次北京市在难度大、经费少、时间短的情况下, 进行了首次外来人口普查, 从整体看是非常成功的。设计的普查方案、细则、表式是在多方反复讨论基础上确定的, 是科学的。由于在组织上有层层健全的机构网络, 并以居住地为原则, 保证了普查方案的顺利完成。从普查数字上看也是可信的, 同北京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相符合。根据以往经验, 普查的漏报现象肯定存在, 此次普查的漏报率为 4.07%, 同国际上普查及大调查比较, 属于高质量范围, 能达到如此程度, 已很不简单。张为民司长特别强调, 你们的这次普查, 为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在方案上提供了经验, 而地理信息系统的尝试, 也为国家探了路。与会专家还指出, 为了做好今后的分析工作, 建议能否再搞个小样本的抽样调查, 以弥补不足。他们还肯定了普查办公室对下步工作的打算, 认为普查工作到此只进行了一半, 资料的开发利用是下一步的关键, 建议多研究对今后工作有哪些可借鉴的方面, 并同政府管理与调控密切结合起来, 真正起到为政府决策服务的作用。

市统计局副局长、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张海坤和常务副主任顾兗州出席了专家鉴定会, 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感谢各位专家在外来人口普查工作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并希望在今后的资料开发中进一步加强合作, 从而使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沈青)